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冷 溶 主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下 卷)

冷 溶 主编

目 录

下卷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形成 (1987年10月—1992年10月)

前言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 形成	(1495)
-----------------------------------	--------

导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7年11月— 1992年1月)	(1513)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文章	(1576)
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	(1708)

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782)
党的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809)
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的深化	(1814)
政治体制改革	(189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899)
加强党的建设和法制建设	(1910)
深化教育、文艺体制改革	(1921)

军队建设	(193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	(1935)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	(1940)
邓小平南巡视察	(1941)
统一战线	(1943)
1989 年政治风波	(1946)

研究文章介绍

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1948)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1980)
关于治理整顿、加快与深化改革	(2015)
关于所有制改革	(2029)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045)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57)
关于对外开放	(2068)
关于新时期思想解放	(2075)
关于邓小平思想研究	(2085)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建设	(2123)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建设	(2142)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2168)
关于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	(2176)
关于和平发展与建立世界新秩序	(2189)
大事记 (1987 年 10 月—1992 年 10 月)	(2202)

前 言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形成

1987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十三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五年。在国际国内的复杂艰难情况下，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在这一年中，邓小平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强调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在改革中要坚持生产，较好地发展。为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又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论断，明确要求“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在这紧要关头，又是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并反复强调，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他又向新领导集体作了政治交代，谆谆教导要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他又及时提出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

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并向世人宣告，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同时还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等等。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按照这些思想精神，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回顾过去，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已经作出回答，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这五年改革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大目标，这标志着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党的十三大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凝聚了邓小平同志的心血。为此他作了艰苦的探索。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一点，列宁、毛泽东都已意识到。列宁说过：“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也提出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概念。但他们都没有形成较成熟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为搞现代化建设认真地研究国情，特别是确立了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观察并认识到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这一事实。因此，1981年6月的历史决议中已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当时并没有展开。

对它真正深刻的认识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实现的。我们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以及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实际上都是在“往后退”，然而在实践中却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到十三大时，我们开始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种格局。这一格局正是建立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这个基础上的。这些都说明，只有承认这一点，客观判定我国目前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才能从根本上对我们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的正确性、合理性做出解释。但是，这需要突破那些根深蒂固的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传统观念。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同志说了一句一度使一些同志不太

理解的关于我们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看，如果按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说，我们是不够格的。这句著名的，坦率而又深刻的话，极大地启发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三大确定以这个问题作为理论的突破口，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说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十三大称之为“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依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一切都要从‘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中有一段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就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也解开了多年来压在我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产生了，小平同志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要解除这个疑问，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首先是从第一个问题上突破的。

过去我们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列宁在革命后根据俄国的现实，虽然不得不允许一部分商品的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让步。斯大林也只是把商品经济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是我党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存在不是暂时的和

一定范围内的。邓小平同志曾说，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有？邓小平认为，明确这一点，是一次真正的理论上的突破，因而也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对“决议”评价极高，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他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与改革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我国与国际上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价值规律的作用日益覆盖全社会的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大大加强了。他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成‘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显然，是改革的实践教育了全党。

但是，当时我们在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还没有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一位领导在向中央报告“决定”设想时，首先明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这很能反映当时全党的认识程度。实际上，国内外的实践已充分说明计划与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与姓什么无关。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而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证明并不成功。如果没有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包袱，而完全从客观实际出发，接受这一点并不困难。可是，这个包袱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还需要实践来继续教育我们。

一向最讲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也是最早最深刻的。我们知道，在1979年他就说过搞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话，1984年10月“决议”通过后，他讲得更加明确。从《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早在十三大之前的1987年2月，他就已经把问题点破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

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他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这使我们在认识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计划与市场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全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回避不了。

十三大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促使邓小平同志对十几年来改革实践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和反思。1992年初他发表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正是这一总结和反思的结果。“谈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许多方面提出新的创见。

这里，邓小平同志再次重提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看到，这次重提，实际上从1990年就开始了。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前，他讲过一次；1991年1、2月间又讲过一次；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是第三次讲。这样集中地讲，不仅与总结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有关，而且与国内改革实践的发展有关。

自1984年10月全面改革以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实践中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党政、政企的矛盾，双重价格体系，条块分割，分配不公，三角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等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年治理整顿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形势得到了稳定。同时，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疲软和效益低下，也突出表现出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企业走向市场，成为改革的关键。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认识上还不统一，怕市场经济搞多了会偏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可见，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突

破它已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善于抓住关键环节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下决心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它的意义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十四大据此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建立这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然而，这一认识突破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如果计划与市场只是手段，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在论述了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段话一下子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使我们搞清楚了我们的一些改革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而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突破，则说明，许多东西根本就与“社”或“资”无关。这样，就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纠缠在许多其实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致力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十几年实践与认识的过程，经过几次理论上的突破，终于在视察南方谈话时对社会主义上升到本质上的认识，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深刻认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全面总结了十几年来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根据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并在党中央几次概括的基础上，从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新的概括，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阶段、任务、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产生，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探索和开辟的是一条新的路子，不断遇到的都是一些新的情况和新问题，处理新问题就会在人们头脑中自然产生政策会不会变、要不要变的问题。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在今后调整的一段时间内，“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变化”。1983年6月，他在同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的谈话时这样说到：“我们走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

1984年10月，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表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赞成。”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都不可能变，变不了”。

1986年底到1987年初，国内少数人闹事，党内领导层人事变动，邓小平同志告诉外国来宾：“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时隔不久，他又说：“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1987年3月，他在同来访的坦桑尼亚

总统姆维尼的谈话时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两个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4月他又进一步说：“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了这条基本路线，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989年9月，他在同李政道的谈话中也说：“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①

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继续强调“不变”的问题，他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②他认为，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明确阐述，他说：“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邓小平同志还要求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中国的政策基本上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人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二者相互贯通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客观要求，共同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南巡的重要谈话中说得很清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①这就告诉我们：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保持稳定，这是邓小平同志自始至终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80年1月，他就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年来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1986年，国内少数学生闹学潮，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初明确指出：“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1989年初，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①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经济建设，什么改革开放，统统搞不成。只有稳定，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反之，不改革开放和不发展经济，物质基础很薄弱，社会政治局面也不可能团结稳定。我们只有坚持基本路线不变，社会政治才会稳定。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到：“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②

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的一个深刻命题。这是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理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的任务，就是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通过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是否还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人们对此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制度下，似乎不存在、也不会发生束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生产力的问题，特别是把社会基本矛盾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试图用政治运动甚至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问题。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越来越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束缚，遭到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当前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通过改革来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所谓解放生产力，是指通过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来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通过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来解放生产力。改革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通过改变原有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来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当然不是指原来意义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场革命。所以，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且反复阐述“改革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和革命并提，实质就在于肯定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早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也这样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当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随后，他在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等人时说得更为明确，我们叫

改革，实际上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这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的命题。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邓小平同志把改革跟革命、解放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赋予改革以新的含义。这对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

把改革提高到解放生产力的高度，这就要求人们一定要有敢闯、敢干、敢于试验的精神。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改革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一个重大的试验”、“一场伟大的试验”，是“探索一条新的路”。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要大，没有胆量是搞不成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认为，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也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们摸索到一些经验，走出了一条新路，但是还不够，步子还不大。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啊，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